



荆州博物馆

楚都故地 珍品荟萃

本报记者 田豆豆



东周雕刻彩绘鸳鸯漆豆



战国彩绘虎座鸟架鼓



战国彩绘浮雕凤鸟莲花漆豆

提起湖北省荆州市，人们习惯称之为“荆州古城”。一则，由于荆州古城墙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四座古城墙之一，碧波荡漾的护城河绕城一周，何谓“城池”，一目了然；二则，由于荆州历史悠久，中华大地古称“九州”，“禹划九州，始有荆州”，荆州名列“九州”之一，建城历史长达3000多年。

漫漫历史长河中，荆州最负盛名之时要数春秋战国时期和三国时期。借助《三国演义》的流传，“刘备借荆州”的故事已是家喻户晓，而据文献记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689年，荆州已经是楚国都城。楚国曾是可与秦国一争高下、“逐鹿中原”的强盛国家。楚国都城，自然是楚国最繁华的城市。随着楚国的发展、疆域的变化，楚国曾多次迁都。但不论迁都至何处，都城的名字都叫做“郢(yǐng)”。至今，荆州城内还有“郢都路”“郢都中学”等以“郢都”命名之地。

古人视死如生，崇尚厚葬。荆州地下古墓众多，出土文物珍品荟萃，名动一时的“越王勾践剑”即于1965年出土于荆州望山楚墓群中。近年来最令考古界震动的要数“熊家家楚墓”，它是目前所见规模最大、保存最好、陵园布局最完整的楚国高等级贵族墓地，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最高水平的代表。

色泽艳丽的楚国漆木器、成色如新的四代越王剑、精美绝伦的战国丝制品……大量打着楚文化鲜明烙印的精美文物，收藏于荆州博物馆内。始建于1958年的荆州博物馆，可谓楚文化的艺术宝库，现有馆藏文物近17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500余件/套，2008年被国家文物局评定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年均接待观众逾100万人次。

楚国漆木器：瑰丽楚文化的艺术呈现

虎座鸟架鼓，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楚国乐器，与编钟、编磬组合使用，一般只出土于楚国贵族墓葬。今天我们途经湖北省会武汉市的火车站、地铁站、大型酒店，常常会看见它的复制件或墙面浮雕、壁画等。在荆州博物馆，可以看见大小不一、色彩纹饰略有不同的多个虎座鸟架鼓。它以两只卧虎为底座，虎背上各站着一只昂首高歌的凤鸟，两只凤鸟之间悬挂一面皮质大鼓。造型优美，色泽大气，兼具实用性。

凤鸟是楚国文物中最常见的形象，在楚国漆器中主要以红、黑二色呈现。这与楚人崇凤的传统有关。崇凤，因为楚人以为凤是其先祖祝融的化身；尚赤，也与楚人先祖祝融是周朝“燔(fán)燎”有关，所谓“燔燎”就是祭天时主管火的官。

荆州是楚国形成和发展的中心区域，在荆州出土的楚国漆器无论数量、种类还是精美程度，都是其它地方无法比拟的，可谓当时的巅峰之作。除了虎座鸟架鼓，荆州博物馆还展出了许多精美绝伦的漆器。有墓主人

生前使用的各种器物，也有专门的丧葬用品。如凤鸟莲花豆，由莲花豆盘和凤鸟雕塑组成，莲花豆盘外壁浮雕着一圈共14片仰瓣莲花，凤鸟的鸟身上精细地描绘了龙、凤、蛇、蟾蜍和鸟羽等多种图案，背部和尾部则绘有双头凤鸟纹和双龙纹。凤鸟的腿呈下蹲状，鸟爪紧紧抓住一条蜷曲的蛇。豆是古代的高足盘，由盘、柄、座三部分组成，可以盛少量食物。不过显然凤鸟莲花豆的装饰性超过它的实用性，从它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楚漆器艺术无论造型还是髹(xiū)漆彩都达到了顶峰。

还有造型可爱的猪形酒具盒，浑圆的“猪身”，两边各一个很“卡通”的猪头。这个距今2300多年的文物至今色泽鲜艳如初，整体光滑锃亮，浮雕猪嘴嘟着，眼睛圆圆的，活灵活现。猪身上绘有一首双身的红色龙纹。这种器形以及花纹在《山海经》中有多处记载，分别被称为“双封”和“遗肥”。这件带龙纹的猪形酒具反映了楚人对这两种神物的信仰和崇拜。

镇墓兽作为古代镇墓辟邪的丧葬用品在楚墓中很常见。一般由方形底座、曲形兽体和鹿角三部分组成。在荆州博物馆看到的巨大镇墓兽，兽像两眼鼓突，口吐长舌，面目狰狞，最特别的是，它的两对鹿角是真的麋鹿鹿角涂漆后插到兽首上的，色泽十分鲜艳。镇墓兽置于棺材的正前方，好像给墓主人站岗的哨兵。

荆州博物馆还陈列了一件战国中期的凭几。它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根雕艺术品之一，集艺术与实用于一身。中国根雕协会的会标原型就是这件文物。它的头像蛇头，身体像龙，尾巴像蜥蜴。它的四条腿上分别雕刻着蛇吃蜥蜴、蜥蜴吃鸟、鸟吃蝉、蝉吃树根的图案，反映了2000多年前古人就已经有了生物链关系的哲学思想，具有独特的考古价值。

战国丝绸宝库：叹为观止的织绣工艺

荆州博物馆里有一处独特的楚汉织绣品展，其中展示的丝绸制品大多出土于马山一

号墓。2300多年前的“蚕丝被”、绵袍、裤子……制造工艺之精湛，刺绣图案之生动，今人难以完全复制。

马山一号墓的墓主人是士阶层中的一位贵族夫人。墓底长3.24米，宽仅1.84米，墓葬规模并不显赫。1982年1月上旬，在马山砖瓦厂取土场，前来调查的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不经意间发现了一座小型土坑竖穴墓。这是一座典型的楚墓，类似的墓葬在荆州纪南城周围屡见不鲜。然而，在考古工作者揭开棺室的一瞬间，他们为此非同寻常的丝质宝藏深深地震撼了。墓主人身穿5层丝绸衣物，衣物外又被13层丝织品层层包裹，由9根提花锦带系好。

丝绸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由于它极易腐烂，在墓葬中很难保存下来。在马山一号墓发现之前，湖南马王堆一号汉墓因其出土了丰富的丝质品而号称“汉代丝绸宝库”。先秦时期的丝织水平与服饰制度如何，人们尚不能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尽知其详。马山一号墓，不仅出土了组合齐全、保存完好的丝织衣物，而且其时代较马王堆汉墓早出近半个世纪，比中国的“丝绸之路”还要早。

这些珍贵的丝织品，不仅年代久远，而且织造技艺十分高超。根据对出土丝织物的分析可知，公元前4至3世纪的楚人已经熟练掌握了饲蚕、缫丝、织造、练染的一整套技术，并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纬线提花针织条带是先秦纺织品种的新发现，这一发现把我国针织技术起源的历史提前到公元前3世纪。

荆州博物馆在展出的丝绸制品旁边，一般还展示真品的复制件，两相对比，真品除了因时间的洗磨有些褪色外，往往比复制品花纹更加生动，让人叹为观止。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野花留宝

簪，碧草见罗裙”，在古诗词中，“罗裙”是常见的意象，衣袂翩翩的女子倩影因之跃然纸上。但古时的“罗”到底是怎样的形态？不能仅凭想象。马山一号墓主人的“龙凤虎纹绣罗单衣”让人见识了战国时“罗”的模样。

罗是一种绞经网孔状的丝织物，轻柔透明，细看可见小小的网眼。让人惊奇的是，



马山一号墓出土的龙凤虎纹绣罗

龙凤虎纹绣罗单衣”的“罗”网眼竟呈六边形，今人复制，只能织出四边形。灰白色的素罗只是“龙凤虎纹绣罗单衣”的绣地。在此之上，古人用多种颜色的丝线绣出了龙、凤、虎三种动物形象。凤鸟双翅张开，脚踏小龙，另一侧是一只全身布满黑红条纹的斑斓老虎，张牙舞爪追逐前方大龙，大龙作抵御状。整件绣品色彩鲜艳，绣工精细。在这种轻柔的素罗上锁绣出纹样繁复的美丽图案，难度极大。这件“龙凤虎纹绣罗单衣”为当时丝制品的巅峰之作，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罗衾不耐五更寒。”李后主词中的“衾”就是被子。马山一号墓出土的“对龙对凤花卉纹绢面绵衾”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蚕丝被”。它长、宽均为1.9米，正上方有一个凹口，正好露出头来。绵衾的花纹也非常生动，对龙对凤，以花草相连，针法娴熟，是绣品中的上乘之作。

中国人何时开始穿裤子，裤子是什么形态的？此墓出土的“鸟花并枝绣棕绢面绵袴”解答了人们的疑惑。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裤子，展开后类似灯笼裤、萝卜裤样式。有意思的是，这条棉袴两裆互不相连，后腰敞开，形成开裆。

熊家家楚墓：规模最大、等级最高

熊家家楚墓是位于荆州区川店镇张场村的一处特大型楚国高等级贵族墓地，整个墓地由主冢、陪冢、车马坑、人殉墓、祭祀坑等组成，是目前发现并发掘的面积最大、规格最高的楚国墓地。2006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墓地进行了系统勘察和局部发掘整理，其成果屡屡引起考古界轰动。

此墓已发现车马坑34座，其中有3辆六马驾车，荆州市在其原址修建了车马阵展区。按照商周礼制，“天子驾六”，一般只有天子才能乘坐六马驾车，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驾三，士人驾二，庶人驾一。尽管西周末年礼崩乐坏，这一制度遭到一定破坏，但从出土的六马驾车可以推断，墓主人身份级别非常高。

熊家家楚墓还发现人殉墓130多座，一人一墓，意味着活人殉葬达130人以上。殉葬者以女性居多，有些女性殉葬者身边发现了一些乐器，可能是墓主人的舞女或者歌女，根据陪葬品判断，有的殉葬者身份比较高贵，可能是墓主人的妻妾。殉葬者大多佩戴玉器，这些玉器也大多展于荆州博物馆。

组玉佩，又称玉杂佩，是多件不同种类的玉佩串联在一起的玉器组合。《诗经·郑风·女曰鸡鸣》中“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的“杂佩”就是指组玉佩，由玉璧、玉环、玉瑱等多种玉器组合而成。在熊家家楚墓，已出土四套完整的组玉佩，由身份较高的女性陪葬者佩戴，有的玉佩上刻有六条龙，可见墓主身份之高贵。

子的材料和工具。反过来，“旅游搭台，文化唱戏”也不可取。其实，与其分辨谁为谁搭台、谁主谁次的问题，不如更深入地考量这个时代我们的旅游心理中的文化色彩。新的文化与旅游部职责涵盖“维护各类文化市场包括旅游市场秩序”，文化市场与旅游市场的关系更为直观。文化融入旅游，成为旅游的“目的地”；旅游反哺文化，成为文化的“涵养地”。它们的融合，指向的正是这个时代我们越来越重视的文化需求。

◎家风家训

姚廷杰：天下唯孝至易

□ 陈兆肆

国风之本在家风，家风之本又在孝道。儒家向来认为，老吾老及人之老，亲亲而后仁民，故孝道乃百善之先，人伦之始，德业之基。在历史长河中，言孝家训不可谓不多，而清代姚廷杰《孝教编》，堪为此中典范。

康熙年间的姚廷杰，字升闻，浙江钱塘人，曾任象山教谕、绍兴府教授，一生力倡斯文，著《孝教编》十四条，以期纯正家风和世风。姚氏虽非名流，但为高士，在如何敬养父母、悦亲事疾、遵守礼制等方面都有详细论述。

姚氏针对世人所谓“天下唯孝至难”的舆论予以驳斥，认为“天下唯孝至易”，因为孝乃人之天性所具，良知良能，孩童亦有。姚氏认为，如果人人能发扬此种天性，事亲尽孝，则父母自然有生活乐趣，而无忧郁不畅。



姚廷杰著《孝教编》

姚氏从如何善处兄弟、夫妇、朋友等诸种关系出发，讨论如何事亲尽孝。他认为，家庭之中，若能做到兄友爱、弟恭敬，则父母必然和睦喜悦；相反，若因嫉妒贪求，兄弟反目成仇，则双亲必会黯然伤心，此即不孝。至于夫妇之爱，本为人之常情，他特别批评的是，作为人子，厚妻而薄亲，认为夫应劝其妇，妇应劝其夫，互相勉励，以全孝道。姚氏观察到，家乡子弟在交友时，往往鄙薄正人君子，所交多酒肉财色、巧言令色之辈，父母训而不从，责而不改，最终遭遇祸事，甚至流为匪类，增添父母无限忧愁，是为不孝。因此，他提出：欲尽孝思，当慎交友。

姚氏认为，妥善安顿父母身心，乃孝子所必行之事。承父母之欢颜，不以声色辞气相加，向来是古人言孝尽孝之一大关切。朱熹曾称，孝子如果对待父母心有深爱，平时态度必然平和温顺，脸上亦会呈现愉色婉容。而姚氏引用朱子之言，感叹当时为人子者对待父母并非如此，相反大多呈现出“愁容怒容、德色傲色、狂态鄙态、顽状蠢状”。对待这些，父母虽会客而忍之，但往往暗自垂泪伤心，久之郁结生病。因此，姚氏提出，身为人子，在父母前，应该平和温顺，时动婉容，以求其欢。

姚氏认为，菽水亦可承欢，贫家子弟亦当尽心竭力，确保奉养无缺。而况，富贵需时，子欲养而亲不待，必定抱憾终生。姚氏严辞批评一些不孝之徒，终日嬉游，置家事于不顾，只图一己之快乐享受，从不顾惜父母之劳顿辛苦。他认为，为人子者，应当勤勤勉勉，家事无分巨细皆能妥为安置，使父母不必劳心劳力，进而身安体适。姚氏还认为，与其在父母生病之后进侍汤药，莫若在父母未病之前好生照顾，所谓嘘寒问暖，饮食起居皆当悉心留意。

古人特别重视对亡亲的葬礼祭祀，并将之视为孝道之最后表现。姚氏在其《孝教编》中也指出，平时对待父母生养之事，四十岁而后有五十岁，五十岁而后有六十、七十岁，尚可先俭而后丰，守待有时；而一旦面临丧事，则父母终身惟此一日，此时不尽心竭力，尚待何时？因此，他主张待亡亲应当“事死如事生”，不仅要竭力厚葬，尤须丧礼如仪，不可马虎。

在姚廷杰看来，“孝道本是庸常，告诫并无深刻”。在家国一体的格局下，家风好则民风淳，民风淳则国风正，国风正则天下太平。是故，作为维系家风好坏之关键的孝道，则显得至关重要。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 虞金星

文化与旅游部日前挂牌了。这个新的国务院组成部门，由原来的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整合组建而成。有人打趣称“诗和远方”终于走到了一起。

当今时代，“远方”已不难去，读诗写诗的人也不少。但怎么能让奔着“远方”而来的人感受到诗情画意，是个问题。旅游是经济活动，它链接着食、住、行等多种资源，能够带动多种产业的综合发展。正因如此，全国各地越来越重视旅游产业发展。但旅游又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它与大家的文化需求密切相关。

如果把旅游理解成“出去看看”，那么不同时代它的重心是有差别的。多年前，经济刚起步，旅游这个概念刚成形，“出去看看”中大家

重视的是“出去”。后来经济发展了，大家见识也多了，“出去看看”开始注重“看什么”，重在“悦目”，好山好水好风景最适宜。这些年，“出去看看”开始侧重“赏心”。好山好水固然看不尽，但风景是相似的，看多了也不过尔尔。唯有文化作底，风景才具有更丰富的内涵，才能让人们品出更深厚悠长的意韵。

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是篇适应时代发展的大文章。要写好这篇文章，不能不认真审视文化与旅游的关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句流行的话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彼时，各个地方的经济大多处于不太发达的阶段，“文化”和“经济”的主次之分很明显，也很自然。最常见的是各地各种名目的文化节，其实更像

是经贸活动的大集市，存在招商引资的意图。等到了旅游逐渐成为经济活动中的“显学”，那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很容易就能转换成“文化搭台，旅游唱戏”。

这种转化倘不假思索，很容易唱歪了经。譬如“古镇热”。早年只是零星的古镇声名鹊起，如今，全国各地名为“古镇”者数不胜数，在满足人们的旅游愿望的同时，也不乏一些批评：不少“古镇”从街巷房屋到商铺旅舍与商业模式，通通千篇一面。有些“古镇”干脆是新修的。这种从商业利益出发的“造景”，文化层面是空洞的，没有本地特色，不见时间痕迹，带给人们的不是“诗和远方”的满足，而是被忽悠的空虚。

很显然，文化不能仅仅视为搭台